

振 扬

——扎木苏荣校长日记摘抄



# 草原之春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草原之春

——扎木苏荣校长日记摘抄

第 一 部

振 杨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缘 起

三年前我奉派到洛克县去采访。到了那里以后，发现那里无论干部或群众，无论妇女或男丁，对教育对知识都喜之若“狂”。从县所在地的城镇，到偏僻的农村、牧区，最好的建筑不用问，都是学校、技术培训中心或实验基地。一排排青砖红瓦，掩映在绿树丛中。一群群青少年，或则书声朗朗，或则追逐嬉戏，天真烂漫；一群群青壮年三三五五地在作各种试验。到处都充满着活力，到处都充满着生机。人们的脸上流露着的是对现实的自信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口中谈论的是科学种田和科学养畜。拿这一次的见闻和我上次在这里的印象相比，真如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当我问及这种巨变的缘由时，人们告诉我，这是从教育开始的，是教育使人们开了窍。随着文化知识的普及，人们开始懂得除了老天爷之外，种田、养草和繁育牲畜还有一个重要法宝，那就是科学。当我又问及是谁抓了本县的教育和科技培训的普及时，人们对我笑了笑说：“自然是党和政府喽！不过要说得具体一点，还应该说是扎县长夫妇来了之后。”

“扎县长？”因为我上次来时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位能人，便不由得流露出了疑问。

“扎木苏荣副县长和他的爱人段怀儒嘛！人家扎县长两夫妇可是有能耐呀！听说原来是大学的校长和什么研究所长呢！”

人们的回答引起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大学校长怎么会来当一名副县长？如果说临时代职下放，又怎么连妻子也一起下来？而且如何能一放几年，象一名扎根干部那样实打实地干起来？于是我决定拜访这位“神秘”人物。

一开始人家虽然出于礼貌热情接待了我，但绝口不谈下来的原因和经过。不过，职业的训练使我找到了他们的“缺口”。我

从他们最乐意谈的县里的过去和现状入手，又谈到对县里的未来他们有哪些设想，也谈了我对这一切的想法看法。随着我们交往的深入，相互了解加深了。最后老扎说：

“你呀，真难缠！在你的身上我感到的热诚是，即便是块顽石，你也决心把它暖热！”

“你不也是这样吗？”听到他的话，我哈哈大笑了一阵反问他一句。

“那好吧，这就满足你的好奇心。不过我可没时间和你婆婆妈妈地唠嗑。”说到这里他从柜子里拉出一只黑色的提包递给我：

“哪，都在这里了！不过，我得忠告你一句，你如果发表它，可是要得罪人的，最好像红楼梦的作者一样‘将真事隐去’，或者径直象港台影视那样，公然声明一下：‘本片纯属虚构’。”

我见他虽然以玩笑的态度将这些话说出，却无法掩饰他对我的担心和关注，便也半真半假地向他笑着说：“这呀，你就放心吧！记得一位作家朋友和一位长官打官司时说过：‘我写的是小说。里面的情节、人物你觉得和你无关，就不必须大动肝火；如果你觉得和你的为人行事有些象，那么应当反躬自问的是你自己，怎么反而找我的麻烦呢！’”

说到这里，两人又禁不住同声大笑起来。

他给我的是他的日记，我只择取我所需要的，按历史学者的作法来了个“年经事纬”，故名之曰“日记摘抄”。其实，因为摘抄的内容绝大多数和工作有关，叫做“工作纪事”倒更确切些。又因为有些事情单从日记所记看不清楚，或只能了解到它的片鳞只爪，我又下了点调查研究的功夫。但这样一来，我可在结构、人称以及给事件“存真”上犯了踌躇。我怕过度的加工会伤损事件的真璞。经过再三考虑，最后我还是决定以“存真”为第一要义，日记中的第一人称，和我对调查的叙述均一仍其旧。至于他人书中人称和结构的疵责，我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 一九七七年一月

—

一月初的一天，物理系教师仁钦巴特，躲进自己的宿舍，准备即将开学的讲义。

最近几天，他的确在“躲”字上下了一番功夫。本来，图书馆的教师阅览室、系里的资料室，这些地方安静且有利用参考书的方便。然而，自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地方也变成热闹场所了。人们一见面，似故友重逢，有说有笑，谁也甭想坐下来干点什么。无可奈何，他只好“躲”进自己狭窄的宿舍里。两间宿舍，一间是厨房，只有另一间可供使用了。可用的这一间，十六平米，房间的北面放一张双人床，他们夫妇同小儿子挤在一张床上。东面，放着两个木制的书架，书架上的书籍摆得满满的，却还有不少书籍，实在无处摆放，只好捆起来，堆在床底下。房间的西面，摆放着一张三屉桌，桌的三边放着三只凳子。一到晚上，夫妇俩加小儿子，三个人挤在一张桌子上，各自完成各自的“作业”。然而，白天小儿子上学，妻子上班后，仁钦巴特独自一人，也算是宽敞的备课地方了。

他准备的是给大学一二年级开的普通物理学。据说物理系的教师一般都不愿意讲授这门课程，因为这门课程课时多，每周要讲七课时或八课时，如果加上实验课，那每周须讲十课时或十二课时；同时，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又是刚刚接触物理学，须花很大力气，才能教懂，费时费力，最好不干这个苦差事。仁钦巴特却非常鄙视这种浅薄的观点。在他看来，对于学生来说，一二年级学得扎实，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得牢固，对于以后的继续学

习，将起到奠基作用；对于教师来说，花力气把一二年级课程教好，对于以后的教学，同样起到奠基作用。所以他诚心实意地要给大学一二年级讲课，准备下一番功夫，把一二年级课程讲好。

他把教科书展开，一章一章地重新阅读，然后把每一章的重点、难点找出来。对于每一章的重点，他准备花更多的时间，反复强调，以引起学生广泛注意。对于难点，他设计几种讲法，深入浅出，由难化易，使学生易于理解。对于重点和难点，还拟出切题的思考题，让学生反复练习。他准备认真批阅学生的练习，亲自指导学生实验；让学生每个学期写两篇文章，每篇不超过三千字，集中论述一个问题，以锻炼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表达能力。

他当研究生时，经常回忆起大学时代的学习生活。使他久久不能忘怀的一个问题是，不少大学生不会自学，仅仅满足于背诵讲义，求得考试及格。这是一件多么可惜的事呀！青年人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而因学习方法不当，把大好时光都浪费掉了。当时他曾向他的导师提过建议，请老师从培养大学生自学能力方面下点儿功夫。今天，他当老师了，他暗自立下誓言，一边教书，一边向大学生做些调查，全面了解一下大学生学习方面的问题，找出原因，逐步解决大学生不会自学的问题。

## 二

一月初的北方，正是严寒季节。通常气温都在 $-20^{\circ}\text{C}$ ~ $-29^{\circ}\text{C}$ 度之间。强劲的西北风，扑在人们的脸上，似锥刺骨。尤其是到下午四时以后，风雪交加，操场上几乎没有几个人了。仁钦巴特天天如是，每天下午五时左右，都要到操场上锻炼一个小时。他脱去棉衣，换上运动衣，穿上跑鞋，冒着寒风跑哇，跑哇，一鼓作气就是三千多米。出汗了，全身轻松极了，舒畅极了。他又开始做操、练武术。

他漫步操场。爆竹的残碎物，几乎布满了全操场。远处清脆的鞭炮声，铿锵的锣鼓声、歌声、口号声连绵不断。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连续两个多月了，至今还未停止。这是可以理解的呀！受尽折磨、蹂躏的人们，一旦获得解放，那种兴奋欢乐的心情，实难用语言来表达。曾记得，作家方纪描写延安抗日人民听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消息时的情景：卖水果的农民，把水果抛向天空，高声喊着让人们享受这“胜利的果实”；中学生从棉衣上取出棉花，倒上汽油，制成火把，游行庆祝。法国作家雨果描写一七九三年法国大革命中巴黎街面上的情景：“仿佛没有一个人闲着的。所有的人都非常忙碌。……每条街都产生一个联队，各方的旗帜你来我往，每面旗帜都有它自己的标法，大的、小的、黄的、绿的、红色的、铅印的、手写的——上面写着这句口号：‘共和国万岁！’”列夫·托尔斯泰描写库图佐夫听到拿破仑的军队已经撤离莫斯科时这样写道：“他的脸突然缩起来，皱起来；他对托尔挥了一下胳膊，然后转向屋东面，转向被挂在那里的神像，‘主呵！我的创造者，您已经答应了我的祷告’……他合着手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俄国得救了！我们感谢您，主呵！’于是他哭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仁钦巴特也是沉浸在欢乐之中的。

他从牛棚里获释，是在粉碎“四人帮”两周之后。他从牛棚里出来，肩上扛着行李，直奔自己的宿舍。当时，墙上、树干上都是大字报、标语，然而他无心去看这些东西。他痛切地认识到，文革期间的大字报、标语，都是一路货色，造谣、中伤、攻击、诽谤，无奇不有，不屑一顾。而他没有想到，现在的大字报、标语都是揭露、声讨“四人帮”的。当他正要跨进自己的小院时，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他门前走过。他转过身来，细细一看，游行者个个身着新装，面带笑容，精神抖擞。“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审判四人帮！”看到、听到这一切，他愣住了，他呆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游行队伍，站了多

长时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忽然精神一振，反问自己，我是在做梦，我是在梦中？不是，不是做梦，我头脑很清楚。他又往前移动几步，仔细观察了一下游行队伍。队伍分成四行，秩序井然，熙熙攘攘，往前看，望不到头，往后看，看不到尾。队伍里有老人，大部分是中青年，还有儿童。人们手握旗帜、鲜花，举起时，象是花的长龙。

“一个晚上就把四人帮统统捕起来了。”

“咋样捕的，当时没反抗吗？”

“据说有的叫到会议室捕的，有的到宿舍捕的，突然袭击，他反抗个屁！”

“王洪文嘟哝着，我是党中央副主席，你们想干什么？未等他的话音落地，手铐‘咔’一声戴上了。”

“江青嘟哝什么啦？”

“主席尸骨未寒，你们……”

“未等她说完，就被推到警车上。”

“张春桥嘟哝什么啦？”

“他嘟哝什么‘抗议’。”

“姚文元呢？”

“他什么也没说，吓瘫了，哈哈！”

“哈哈！”

听到这些议论，仁钦巴特顿时觉得有股暖流涌向自己的心头，全身是劲，眼前的一切似乎都是明亮的、美好的，一个人间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他不由自主地插入游行队伍，同大家一起游行，欢呼。

游行队伍继续前进。仁钦巴特肩上扛着行李，不时地交换着位置，但他没有沉重的感觉，仿佛他身上没有什么东西似的。当队伍到达广场时，东一路、西一路，数不清，反正是多路游行队伍，都汇合在一起了。人的海洋，花的海洋，旗帜的海洋。场上

立即转入狂欢。

仁钦巴特是出于劳累，抑或是出于方便，顺手把行李放在地上，尽情的欢呼、跳跃！他不时地看看自己的行李。有一次，他一低头，看见一儿童坐在他的行李上，看情况是小家伙累了。

“累了吧！小朋友！好好休息休息。”

“嗯！叔叔，可以坐吗？”小朋友有礼貌地说。

“可以，完全可以！”

这一段简单的对话，被旁边一位中年妇女听见了。她回头一看“啊”的一声，惊讶地说：“是你！是你！你也来了，放出来啦？”

仁钦巴特也愣住了。

“是你，是你！我是今天放出来的。”

原来这位妇女是仁钦巴特的妻子。他们夫妇在此会面了。他们互相观望着，又惊又奇，心情是兴奋的、激动的，同时又是悲痛的，而兴奋的心情压下悲痛的心情。妻子低下头，冲着坐在行李上的儿子：

“宝宝快站起来，你看他是谁！？”

小家伙立即站了起来，望着仁钦巴特，半天不语。

“你不认识他了吗？他不是你爸爸嘛？”妈妈告诉儿子。

小家伙还是不说话，妈妈有些着急了。

“你真的不认识？”

“不是，不是！我爸爸没有那么长的胡子。”

儿子的这句话把仁钦巴特逗笑了。关进牛棚时，孩子才五岁。今天，孩子十岁了。哪还认识？他上去抱起自己的儿子，不停地吻，吻呀！小家伙摸着爸爸的胡须：

“爸爸你咋不刮胡子，这么长，多难看？！”

“我刮，我刮！走，咱们回家刮胡子去！”

### 三

“适当的欢乐，能焕发人们奋发向上的思想感情，过分的无休止的欢乐倒要影响自己的事业。备好课，讲课取得好的效果，这是最好的庆贺！”仁钦巴特在回家狂欢了一个月之后，这样提醒自己。于是他躲在宿舍里，继续备课。

听说文革期间编出一套新的物理学讲义，都放在资料室。他一心要看看这些讲义，吸取新知识，以充实自己讲课的内容。资料室两间房，中间的墙是打通了的。四周并排放着书架，房中间放着一排排长条桌，环视一下整个资料室，新讲义占据着所有书架的一半。他顺手拿起一本，办了借阅手续，急急忙忙回到宿舍里。

讲义十六开，厚厚一大本。有前言、有目录、分章，章里又分节。前言部分，开篇第一段录有“最高指示”，往下每一章的前边，都先写有“最高指示”。前言写道：“本讲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派集体撰写，是教育革命的一个丰硕成果。本讲义突出的优点就在于它打破物理学的旧体系，一扫学理工科的不会开机器，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建立了科学的、联系实际的新体系。”

这个前言引起了仁钦巴特的极大的兴趣。什么“打破物理学的旧体系”，什么“物理学脱离实际”，什么“理工科的学生不会开机器”，什么“新体系”，多么新鲜，从来未听说过。这使仁钦巴特“爱”不释手，一个劲地看下去。这部讲义并不难读，里边没有编进国内国外新的物理成就，没有繁难的数据、演算，而且每一章前都录几段“最高指示”，然后根据最高指示精神讲一些物理现象，接着就是所谓联系实际，这个机器如何开，那个机器如何维修。一个上午认真地看，下午继续看，晚上一直看到深夜。一连看了三天，总算从头到尾，细细看了一遍。

他掩卷思索了半天，然后在新编讲义的封面上写了如下一段

话：

“把政治家言论当作最高指示，并用来指导物理学，让物理学去附会这些言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扼杀物理科学，同时也把政治家的言论看成是无所不包的神话了。说物理学有什么旧体系，脱离实际，这实际上还未读懂物理学，是愚昧无知的瞎说。所谓新体系，就是使学生会开机器，并列出了拖拉机、收割机、柴油机、发电机、车钳铣刨。这不但构不成新体系，反而是在摆杂货摊。”

#### 四

仁钦巴特感到百思不解的是，为什么能编出这样低劣的讲义？是谁主持编写的？真的用这套讲义给学生讲授了吗？

他带着这些问题，逢人便问，一连问了物理系二十多位教师，大致了解了究竟。原来是按照“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的指导原则，按照姚文元“学文的不会写文章，学理工科的不会开机器”的教诲，由工宣队牵头，组织部分师生编写的。为了使学生会开机器，工宣队还带领部分师生到社会上调查，有多少机器，讲义上就写多少机器。

有的教师还告诉仁钦巴特：历史系把一部中国通史诬为儒法斗争史。

有的教师告诉仁钦巴特：中文系只讲八个样板戏，批宋江，把中国文学、外国文学都诬为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

有的教师告诉仁钦巴特：艺术系把用石膏做的人体像，全部毁掉，说什么赤裸裸的人体像，是宣扬资产阶级色情观念、腐蚀青少年。

有的……

听了这些介绍，他眉头紧锁，面色阴沉，心情沉重。“没有料到，不敢想象。”“生活中竟然会出现这样的怪事？”“无法理解，实在无法理解？！”他自言自语地说。作为一位学者，再没有比践踏科学事业更使他痛心的了。他已经陷入沉思之中。这沉思萦绕于胸怀，使他无法摆脱掉。

## 五

一天早晨七时许，仁钦巴特用过早餐，穿上大衣，把文革时期编的讲义装进书包，走出家门，直奔系办公室，去见系工宣队负责人和系革委会主任。

天下着鹅毛大雪。雪花象棉絮，挂在树梢上，酷似白花。大地、楼房、树，一切白花花。仁钦巴特踩着积雪，一步一个大雪窝，每拔一步，都十分艰难。他感觉到这种艰巨性，但他毫不在乎，一直向前走着。他的心情是急切的。他要向系里申明，新编的讲义无论如何不能再使用。他拟建议系里立即动员全体教师，在开学前拟出新的大纲，如果来不及，那就暂时采用文革前编的教科书。基于这种急切的心情，他不顾风雪的袭击，用了半个小时，到达系办公室。

工宣队负责人，是一位老工人，看上去象是六十开外的人了。他满脸皱纹，十指弯曲，佝偻着腰，显示出他是一位劳动者。他仍身着工作服，手握着重烟斗，从外表看去，还未减工人的“本色”。

系革委会主任那仁朝鲁，大家比较熟悉他。文革开始时，他刚满二十岁。上学时因不用功，老是跟不上班，高中一年级未念完就辍学在系里当办事员。但他又认为办事员地位低下，被人瞧不起。他愤世嫉俗，从文革刚开始，就扯旗造反，不料一跃而成为系革委会主任，从此便神气十足，不可一世。

他们二位见仁钦巴特走进办公室，立即站了起来，给仁钦巴

特让座。

系办公室，两大间，在目前的条件下，算十分宽敞了。崭新的沙发，在办公室东西摆设的整齐有序。每对沙发的前边，放着明亮的玻璃茶几。地毯、挂衣架、电风扇、录音机、电视机件件新颖，可谓现代化了。办公室的南面，并排放着两张办公桌，工宣队负责人坐在左方，系革委会主任坐在右方。原来他们各自都有一个办公室，由于天天，甚至时时要讨论怎样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为了方便起见，两位常常在一个办公室办公。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二人更是形影不离了。此时此刻，他们二人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惶恐不安提心吊胆。想“四人帮”粉碎后，是不是很快就要收拾他们这些积极跟着“四人帮”干的人，挨批斗，关牛棚，甚至进监狱；另一方面他们又自我安慰，怀抱一线希望。特别是看到报纸上还经常出现“凡是主席决定的决策，都要无条件地执行”时，更感到由衷的高兴。如果按照这些精神继续下去，那他们自己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他们自己也清楚，这“一线希望”，仅仅是“一线”，甚至是渺茫的。所以，自粉碎“四人帮”以后两个多月来，他们常常饮食难进、夜不能寐，坐立不安。面孔白而黄，眼睛陷而直。今天，仁钦巴特找他们谈话，使他们更感到恐惧，难办，无所措手足。他们分析，仁钦巴特肯定会提出一大堆问题，诸如，根据什么关牛棚，是谁主张关的？还可能提出很多苛刻的条件，诸如必须恢复名誉，必须惩办凶手，必须赔偿经济损失。他们进而分析，如果提出的问题不能回答，提出的条件不能满足，仁钦巴特有可能在一气之下抡拳头。如果抡起拳头来，他们是抵挡不过的。因为他们也知道，仁钦巴特个子高，力气足，又会武术。总之，怕群众起来收拾他们，这也是他们形影不离的原因之一。

当仁钦巴特把书包放在茶几上，脱下大衣，刚一落坐，两人便抢着赶上来，一个忙着递茶，一个忙着点烟；一个忙着把大衣挂

到衣服架上，一个忙喊服务员打水。殷勤、笑脸、热情，超乎寻常。

“快喝茶，喝茶！”工宣队负责人说，“天气很冷吧？”

主任那仁朝鲁说：

“身体怎么样，快吸烟！”

工宣队负责人说：

“关了这么长时间，不应该，不应该！”

主任那仁朝鲁说：

“都怪‘四人帮’。粉碎‘四人帮’，我们大家都高兴！”

“哈、哈、哈、哈……”两位虽然笑得不真实，但很响亮。

这一暂短的殷勤，到使仁钦巴特增添了某些欣慰感。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他们那付神气十足不可一世的态度，今天不见了。如果他们今天能接受他的意见，不用新编的讲义，那就是求之不得的了。

“关牛棚，不应该，怪谁呢？这些已经过去了，别再提了。我今天……”

没有等仁钦巴特说完，两位头儿又站起：“哈、哈、哈”笑了起来。这回笑，是真笑，自粉碎“四人帮”以来是第一次真笑，眉开眼笑。

工宣队负责人抢着说：

“你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但我们是实在过意不去。哈、哈、哈。”

主任那仁朝鲁接着说：

“您越是宽宏大量，我们越感到内疚，哈、哈、哈。”

仁钦巴特听了这些恭维话，觉得谈论这些，应当到此为止，再寒暄多了，实在没有意思。于是他把话锋一转，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我今天到这里来，是同你们商量一件事，我仔细看了

文革时期编写的物理学讲义，这部讲义错误很多，质量低劣，要立即停止使用。”

说到这里，仁钦巴特打开放在茶几上的书包，取出新编的讲义，取出笔记本，放在茶几上。他把新编的讲义展开，以科学观点，翔实材料和实验数据，言简意赅，指出错在哪里，质量低劣表现在什么地方。他一口气讲了四十多分钟。

工宣队负责人，革委会主任听得都很认真，那仁朝鲁不时地还往本子上面记点什么。

工宣队负责人听了之后，总觉得仁钦巴特虽讲得头头是道，但似乎又未说服他。所以，他望着仁钦巴特，笑了笑：“咱们说直话吧，学文的不会写文章，学理工科的，不会开机器，这话是姚文元说的，今天姚文元被打倒了，但他讲的话不一定全错。我就气得不行，大学生，念了那么多书，不会开机器，那算什么大学生，要这个大学生有什么用？所以编写教材时，我就主张大学生要会使用三机一泵——拖拉机、收割机、柴油机、水泵，还要会使用车、铣、刨——不会这些，还算什么大学生！”

这位工宣队负责人说话时，气很粗，真可谓理直气壮，坚信不疑。这使仁钦巴特为之一怔：“我讲了半天，他还未懂得我的意思。”他暗暗地想。于是他伸手从书包里取出一本《普通物理学》站了起来，走到工宣队负责人办公桌前，把书本展开在工宣队负责人面前，一边翻着，一边耐心而又通俗的讲解《普通物理学》是一门什么性质的科学。大致又讲了十分钟，工宣队负责人见仁钦巴特站着讲，有点过意不去。他急忙站起来，十分客气地让仁钦巴特坐下。在工宣队负责人的谦让下，仁钦巴特又回到原座位上，坐了下来。

“老仁，”他亲切地称呼他。

“你讲什么《普通物理学》，我一点也不懂。我在旧社会没念一天书，十五岁进工厂，干了三十多年。解放以后，国家对工

人搞双补（补文化、补技术），语文、数学取得小学合格证，但技术可是补得不错呀，车、铣、刨我都会开，六级工。连我都会开机器，大学生就不会开，那怎么行？”

工宣队负责人这一段话，提醒了仁钦巴特。原来这位老工人是这样的身世，这样的文化程度，这与他坚持的所谓“真理”是成正比的。没有必要再同这位老工人争论下去了。于是他转向那仁朝鲁：

“你有什么意见？”

在工宣队负责人同仁钦巴特争论时，那仁朝鲁一言不发。但他是暗暗同情工宣队负责人的。他是同意工宣队负责人的“真理”，抑或是同意他的态度呢？恐怕是二者兼而有之。但更同意的是态度。他认为如果态度一变，就此打开缺口，象洪水一样，不仅教育革命成果付诸东流，自己也就不“正确”了。

“我看还是按上边的指示办吧！”

那仁朝鲁简单地说了一句之后，伸手从办公桌拿起好几张报纸。眼睛盯住报纸，念给仁钦巴特听。什么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坚持“两个凡是”，什么“你办事、我放心”，这一句，那一句，足足念了十分钟，然后抬起头，面向着仁钦巴特：“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千万不要以为‘四人帮’错了，文化大革命也错了。”

那仁朝鲁这种态度，这种思想观点，这种回答问题的方式，是仁钦巴特万万没有料到的。他立刻暗暗责怪自己。原来他想，按物理学本来面貌讲授，是天经地义的，是极简单的事情，不料问题弄得这么复杂。他怪自己对于复杂情况缺乏分析，碰壁是应该的。他用牙咬住自己的嘴唇，默默不语。

“啪、啪、啪”外边一阵敲门声。

那仁朝鲁说了一声：“请进！”

推门进来的是本系的两位教师。一位是张敏，三十多岁，女

同胞，头发短短的，活象一位男子汉。一位是本系教师那木曹都，三十多岁。

工宣队负责人、主任那仁朝鲁急忙站了起来，让座、斟茶、点烟。仍旧十分殷勤、热情。

这时，仁钦巴特也站了起来，对于两位教师作了礼节性的欢迎。

“你们是不是谈工作？如果你们没有谈完，我们改日再来！”没等人们坐定，张敏很有礼貌地说。

“是在谈工作。”工宣队负责人说。

“工作已谈完了，你们若是有事的话，下边的时间就是你们的。我谈完了，谈完了。”仁钦巴特特别强调说。

“请坐，请坐，大家坐下！”那仁朝鲁一再恭维地让着，挥动着手让着。

大家坐定之后，那木曹都首先发言：

“离三月初开学没有几天了，实验室至今还未动手整修。文革期间，造反派从实验室拿走三千多件仪器和器械，去办半导体厂，应赶快把这些要回来。否则，到开学时，一个实验也开不出来。”从那木曹都的言语中看出，他们着急，但又束手无策。一个普通教师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他是请求工宣队负责人、系革委会主任，以系里名义，用他们的权力来抓这件事。

“这几天有好几位教师到我家里，建议制定教学计划，制定每周的授课表，恢复教学秩序。今天我到这里，是反映大家的意见。乱哄哄，一会儿写大字报，一会儿批判会，一会儿开门办学，没有一个正常的秩序怎么行？”张敏接着说。

工宣队负责人听了两位教师的意见之后，内心里立即产生了一种极为不满的情绪。先是仁钦巴特来，接着是他们两位，提出的问题似乎都是针对他个人的。仁钦巴特指出的讲义问题，是针对他的，那木曹都提的问题也是针对他的。因为他支持造反派办半